



吴岩在《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增补版)》座谈会上作分享。 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 寻找中国科幻的源头

本报记者 韩扬眉

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是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鲁迅最早提出了科幻小说是科学普及载体的观点，1925年我国可能已经产生了第一部科幻电影……

在最近出版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增补版)》中，呈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中国科幻百年发展的通识性作品，该书收录了百年来代表性作家、作品与核心思潮。近日，就中国科幻小说史的起源、发展，《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本书主编、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

## 起点

《中国科学报》：在书中，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被认定为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这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小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吴岩：这部小说是梁启超在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创作的。小说想象了60年后，中国繁荣昌盛，各国代表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议。此时恰逢维新变法50周年纪念，孔子后人孔觉民为两万听众演讲60年来中国从维新成功，到各省独立进而形成联邦大共和国，再到击败列强走向辉煌的“革命往事”。

梁启超之所以写这样一部小说，是因为他认为自上而下改变中国不太可能了，便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变。他在逃亡日本的途中，读到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萌生效仿之念，到日本后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呼吁“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小说”。在《新小说》中提出“哲学科学小说”的类别，哲学科学小说逐渐发展为后来的科幻小说。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就刊登了《新中国未来记》。

值得一提的是，《新小说》创刊号还发表了梁启超翻译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世界末日记》、凡尔纳的《海底旅行》两篇作品。这也使得该刊成为中国科幻的标志性起点，可以说，1902年是中国科幻元年。

《中国科学报》：这部小说听起来含“科”量并不高，为什么说它是科幻小说？

吴岩：把《新中国未来记》作为第一部科幻小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确实它对于科学的幻想没那么多。但在我们看来，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描绘“未来世界”的尝试。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人想象未来的步伐，启动了中文文学的未来叙事。这一章的撰写者贾立元认为，书中拟想的黄白种族大战、纪元争论、乌托邦畅想、少年强则国

强的路径等，都在晚清后来的科幻小说中得以展开。中国人想象科学、想象国家、想象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都是从《新中国未来记》开始的。

《中国科学报》：中国文学向来有想象的传统，比如嫦娥奔月、女娲补天，以及《桃花源记》《聊斋志异》等故事，它们不能被称为科幻小说吗？

吴岩：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既非“科学幻想”，也没有对于“未来”的想象。就像本书中负责晚清与民国科幻史研究的任冬梅研究员所说的，古人的想象其实是一个“梦境”，没有时间的指向，直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传入中国后，晚清知识分子脑海中才开始想象未来。

《中国科学报》：那不是意味着，我国科幻小说的起步受域外作品的影响很大？

吴岩：是的，将域外科幻作品移植到本土，是中国科幻创作发生的直接诱因。最早进入中国的科幻作品是《百年一觉》，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在1891年创作的。小说描绘了资本主义竞争消亡、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2000年，为国人带来了关于乌托邦社会的全新想象。在众多译作中，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小说最受追捧，如《八十日环游记》《十五小豪杰》《海底两万里》等。

域外科幻还展示了许多新主题如乌托邦、高科技战争、星球殖民等，新人物如科学家、新时空如云端、海底、地心等，情节驱动的新道具如气球、潜艇、X光等。这些都为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

《中国科学报》：在中国科幻的起步阶段，我们本土还有哪些有代表性的作品？

吴岩：《女蜗石》是中国最早描写女性主导的科技乌托邦的长篇小说。作者是“海天独啸子”（身份不详），讲述的是留学归来的女刺客金福蕊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增补版)》封面。

刺杀太后失败后，误入表面是妓院、实为女性科技乌托邦的“天香院”，联络各路女豪杰共谋救国大业的故事。

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是第一篇描绘太空旅行的中国小说。小说以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的戏剧化方式，展现了中西交汇时代先觉者们的精

神苦闷和奋进以求出路的挣扎与狂想。

署名“荒江钓叟”之人(身份不详)于1904至1906年间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描绘地外文明及星系战争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展现科技乌托邦的长篇小说。它接续了《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的结尾，借助时空错位的贾宝玉之眼，浓缩地再现了中国在近代遭受的一系列梦魇般的挫败与焦虑，提出一个时代命题：西方既是学习榜样，又是需要反抗的侵略者，中国如何在自我改造的同时保持本民族有价值的传统。就思想性、艺术性、完整性而言，其代表了晚清科幻的最高成就。

《中国科学报》：本书为2022年推出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的增补版，增补了哪些内容？

吴岩：这一版里加了很多注释，也补充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

举个例子，我们“发掘”出了中国原创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中国的科幻电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过去认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它改编自作家童恩正同名作品，展现了激光武器、机器人和先进设备。

最近我们在一本电影杂志上发现了电影《隐身衣》的一些剧照。这部电影1925年由开心影业公司推出，改编自徐卓卓的小说。徐卓卓是一位“斜杠青年”，他既是编剧、导演，又是演员，开心影业公司也是他与人合办的。

经过与业内专家讨论，我们认为《隐身衣》是中国最早的科幻电影。也许以后有人能找到更早的本土科幻电影，但《隐身衣》的发现，至少说明我们的科幻小说、电影，基本上是与国际同步的。科幻小说不像美国教科书书讲的那样是美国的文学，即从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提出这一概念开始，也不像英国人讲的从1818年玛丽·雪莱开始。中国科幻有自己的脉络、关注点，它和我们的时代、生活、理想不可分割。

## 流派

《中国科学报》：《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增补版)》中呈现了许多作品，它们分哪些流派？

吴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把科幻小说当成科学普及的一种方式。这个观点最早是鲁迅先生提出的。1903年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后写了一篇序言，提到科幻小说(科幻)是科学普及的载体，应该是科学的。他认为科学虽然对国家有益，但如果只讲枯燥的知识，是很难读下去的。唯有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才能让读者在感受故事和情感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科学，这一认知影响了其后70余年的创作。

第二个流派是“科幻现实主义”。它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正值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科幻作家认为不能总是停留在科普层面，也得反思社会、面向现实。童恩正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彻底更新了科幻小说的写作模式。他将技术创新、科学发现的细节推向边缘，核心放在人物塑造上。他以科学人生观代替科学的观点引发了“科幻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与此同时，老一辈科幻作家郑文光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这类作品既讲科学的发展，又反思科学，并探讨科技如何影响人类生活。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十几年前，以陈楸帆为代表的中生代作家重提“科幻现实主义”。与郑文光等人不同，他的意思是，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融入了科学，传统文学的那些方法不足以反映今天的时代，需要一种能反映科学时代的方法，“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比如，他的《荒潮》《剥海》等作品涉及环境保护、全球资本流动、电子垃圾等现实性、国际性的议题，更强调如何解决这些议题。

《中国科学报》：在这两个流派之外，你为什么又提出了一个“科幻未来主义”流派？

吴岩：刚刚谈到的两个流派是业界公认的，

但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我把这本书里的作品一个挑出来，看每个作品是科普的还是科幻现实主义的，是科普的就装在科普的筐里，是科幻现实主义的装在科幻现实主义的筐里。等到我把百年的作品分门别类之后，还有大量的作品不能装在这两个筐里，也没被公开分类过，我给它们贴了个标签叫“科幻未来主义”。

它强调对科技和未来发展的洞察和向善的信念、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重视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性，为文学提供新的结构和解域方式。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以更具智慧与前瞻性的方式面向未来。科幻未来主义也是在中国本土创作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基于此，我还分了四类：一是蓝图未来主义，对未来有明确几步走的计划，比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二是演进未来主义，它始于某个突发事件，随事件推演滑向不可预知的结局；三是体验未来主义，通过具象化的生活细节，让读者沉浸于未来的氛围之中，从而激发对未来的向往，比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四是混合未来主义，这类作品混合了上述三类元素，《流浪地球》可归为此类。

## 想象力

《中国科学报》：很多创作者说，看科幻小说、电影可以激发想象力，而长期以来，公众对科幻的认知往往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主导。在你看来，这是否会限制我们想象力的空间？

吴岩：想象力关乎未来，好莱坞的科幻大片风靡全球，这不仅展现了它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是一种文化“殖民”。它在公众心中定义了“未来”的样子，仿佛唯有符合美式、符合好莱坞的才是未来。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未来定义权”的概念——谁掌握了未来定义权，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与文化主导权。

不可否认，正如之前讨论的，自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之时便深受外来作品的影响。但在当下，中国科幻的使命是要构建自主的叙事体系。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取代谁，而是希望开创一个多元化的未来，一位挪威学者提出的“共同未来”也是这个意思，每个民族都应该在“未来”想象上有所贡献。

《中国科学报》：你在南方科技大学讲授“未来学方法”“想象力入门”等课程，你是如何培养学生想象力的？

吴岩：“想象力入门”主要从认知科学、脑科学、想象力的心理学角度讨论想象力的基本构造；“未来学方法”教学生怎么去建构未来。我们学校开了10年的“未来学方法”课。今年在开课之初，我突然有个想法：AI时代，我讲的那些东西可能已经没用了，于是在课堂上让学生一人拿一张纸，写下讲什么、怎么讲、想要知道什么，我就按照学生写下的讲。

我有很大的雄心做这件事儿，但看到他们的回复时很泄气，他们的需求并没有超出我的大纲。缺乏想象力和对自己未来的责任心令我印象深刻。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我现在每节课都会做一个全新的尝试。

《中国科学报》：AI时代，我们如何守护自己的想象力？

吴岩：在AI时代，人的不可替代性核心在美感、判断力和独创性，这些是人类经过积累经验、阅读，以及领悟加工而独有的东西。尽管好多人用AI创作科幻作品，但判断它好不好、新不新，需要丰富的科幻作品作为参照。

举个例子，刘慈欣的《三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集成并重构了中外优秀的科幻作品，小说每隔两三页就抛出一个崭新的设定，这种密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读者觉得某些想法似曾相识，但又说不清出处的原因。当然，刘慈欣也有自己的创造，像二维化、黑暗森林的设定等，都有独到之处。

我想，科幻作品具有文理兼容性，是培养想象力的最佳载体，而阅读科幻史，让读者领悟作家运用想象力的方法，这是AI无法替代的。

# 袁隆平的“数字哲学”

史晓雷

到今年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离开我们5年了。在袁隆平院士去世的2021年，我的工作单位调到了湖南农业大学。这里与他生前的工作单位——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近在咫尺，也因此时常听到与袁老有关的丰富多彩的故事。2023年，在湖南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学校专门在老图书馆的二楼辟出600多平方米的空间，开设了袁隆平科学家精神展示馆。我所在的通识教育中心正好负责该馆的运维。得工作之便，我时常翻阅袁老的一些资料，常读常新，最近发现袁老一生与数字有一些独特又有趣的关联。

## 以数治学

提到数字，我先讲一个袁老与数学的故事。他在重庆读中学时，一度困惑于数学课上的乘法运算法则。他回忆说：“正正得正、负负得正，这使我感到很难理解，正数乘以正数得到的是正数，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也得正数？”老师也无法解释，便告知这是一种运算法则，只需要记住。

渐渐地，他对数学失去了兴趣，有时整个晚上一个题也解不出来。好在同桌林华宝数学在

行，两人便达成协议，袁隆平教林华宝游泳，林华宝教袁隆平数学。后来两人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就一段佳话。

不过，数学没学好并没有妨碍袁隆平后来娴熟地运用数字凝练科研成果或提出设想。1966年，他在《科学通报》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提出了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育种思想，开启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到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标志着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后来，袁隆平又总结出“三系法”杂交水稻的“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三个阶段的战略设想，从三系法、两系法再到一系法，朝着由繁到简、效率逐步提高的方向发展。

1995年，由我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成功，比同熟期三系法杂交水稻增产5%至10%，且米质更优。随着杂交水稻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2018年，他将原来的三阶段论修正为“五代”论，最高阶段是利用无融合生殖固定水稻杂种优

势的第五代杂交稻，目前已进入大田试验阶段，成果表现优异。

在水稻丰产方面，2006年袁隆平审时度势提出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简单说就是种三亩超级稻的产量，是原来种四亩普通稻的产量。2008年9月初，袁隆平到安徽芜湖六郎镇“种三产四”示范基地考察。当得知亩产700公斤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笑着说：“你们这块田往年亩产500公斤，今年700公斤，三七二十一，我们三亩收四亩的产量，还多出100公斤！”以湖南省为例，2007到2017年，“种三产四”工程累计增产稻谷近百亿公斤。

在“种三产四”的基础上，2013年袁隆平又提出粮食高产的“三一工程”，即用三分地年产量360公斤，支撑一个人全年的口粮。“三一工程”有多种模式，比如双季超级稻、一季超级稻加马铃薯、春玉米加一季超级稻等。

湖南省2018年启动“三一工程”，到2020年第一期结束，各种示范模式周年亩产粮食折合原粮1200公斤以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2020年11月，袁隆平在出席第三代杂交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新闻发布会上又提出，希望能将“三一工程”变成“两一工程”，也即实现

两分地年产量360公斤。袁老这一遗愿目前还在攻关的道路上。

## 以数为趣

生活中的袁隆平也善于利用数字、应用数字。他家有三个儿子，老大因为是一节一出生，小名就叫“五一”。等到老二、老三出生后，就直接顺延了老大的小名，依次叫“五二”“五三”。

最有趣的是，他还善于将水稻科研的某个数字特征与身边科研人员名字联系起来，以绰号称之。水稻育种专家邓启云是他的学生，2002年选育了一种每个穗谷重8克的超级稻品种，袁隆平此后再诙谐地称他为“邓八克”。

还有一个“金23”的故事。“金23A”(选育编号)本来是20世纪90年代湖南常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李伊良、夏胜平等人选育的我国第一个优质三系不育系品种，开创了我国杂交水稻既优质又高产的先河。由于在“金23A”选育与示范过程中，夏胜平多次向袁隆平请教而相



20世纪70年代，袁隆平在办公室。 作者供图

熟，袁老每次在同行专家面前都称夏胜平为“金23”。夏胜平后来深情回忆说：“我从事杂交水稻研究30余年，获得过多项国家奖励和荣誉称号，但袁老师叫我‘金23’，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勉励与肯定。”

从不语“负负得正”的懵懂少年，到“杂交水稻之父”与“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将精进的数字融入了他矢志一生的杂交水稻事业。这些数字不仅勾勒了杂交水稻发展的蓝图，也辉映着他幽默风趣、简单率真的人生。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